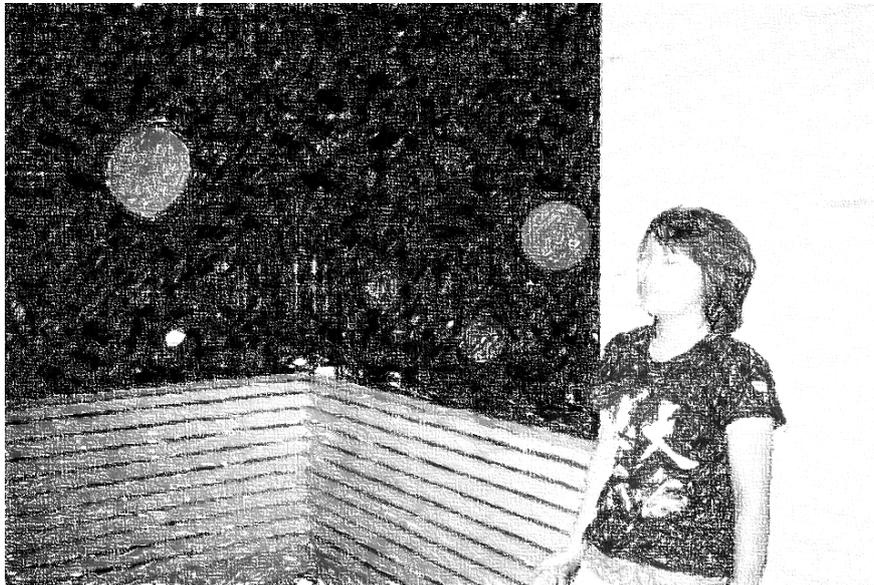


# 我的大腸花：見不得光的運動者自述

社學四 許恩恩



三一八反服貿佔領運動的後期，出現了大腸花論壇，當這場運動被認為是對現有代議民主制度的翻轉時，大腸花則被認為是另一種翻轉這場運動裡集中的權力核心和資訊不對稱的幹譙模式，挑戰這次運動當中主流的知識文明形象，且帶有強烈的漢人本土陽剛氣概。選擇以此為題，是希望能透過共同經歷過的運動文化來拉近溝通距離，形式上未仿照，精神上則也意圖再做一層翻轉，以一個相對接近權力核心，用不那麼正當勇敢的姿態，去談論這些不滿、焦慮、憤恨的運動感受。

我的大腸花，將首先以「大敘事下的個別運動真實」為這次運動後的核心關懷，並檢討在過去運動參與以及這次佔領後續對於「要去做組織，當一個組織者」的實踐心得，並接著指出何以在這次運動當中累積起的傷害使許多人成為「不在陽光下盛開的花」。

占領結束以後我選擇創立並待在「民主鬥陣」延續兩岸與自由貿易議題的路線，遭遇到許多認知差異與凝聚共識合作的困境，回頭再去省思這段時間所體學習的「左翼論述與他國經驗」。

在這之後因機緣得以出國交流，呼應了這場運動的感受和反省「捆縛於歷史之中：沖繩交流」，最後則回到我做為運動參與個體是一個「自我感覺差勁的『既得利益者』」，思考如何面對自己，和與我有類似處境的運動夥伴們真正對這場運動提出檢討，想像未來該如何繼續搞運動。

## 大敘事下的個別運動真實

三月占領立法院運動之後砲火隆隆的幾個月，街頭故事和評論讀也讀不完，無論是基於讚揚或批判，又或許只是廉價的心得，我都不斷的想回答這個問題：「我跟這場運動的關係是什麼？」因為在這場隔離出不同空間，又拉長好一段時間，資訊爆量的高張力來往處境之下，裡裡外外深深淺淺，沒有人能夠宣稱掌握到這場運動的全貌，也沒有人能自外其中，即便是在看似相近的位置，對相同的事件，也可能有大相逕庭的看法，對不同個人的意義自然天差地遠，如何描述其中的每一個「我」才是差異的關鍵，即便這些自我敘事對於整場運動不見得有實際的幫助，對於一場歷史性的運動而言，記錄這些事情也不見得有給後人的參考價值，但對過去在相近的運動網絡中的行動者而言，去認知和分享每個人在這場運動中寫實、尖銳、衝突的感受，是對能夠試圖去彌補生命經驗的巨大落差，而這落差來自外界對這場運動高重視、高評價，我們部分行動者卻在其中感到高挫折、高傷害，所以我想先放下這場運動中實質的議題論述和方法，將這幾十天當作一趟旅程來寫下筆記，試圖拼湊出理想以外的生活樣貌。

即便從去年開始關心服貿議題，在學校社團內進行討論，但對於偏向國族論述的策略操作感到保留，一直未深入參與當時主抓此議題的學生團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活動，比較傾向以階級觀點和工運團體的論述去理解兩岸自由貿易，沒有直接策畫和參與行動，今年三月有一連串活動和晚會，由於議題緊迫，加上張慶忠事件的催化，第一天晚上原先就預定要到現場去，抵達立法院時，最初的第一批已經衝入議場，多少懷抱著衝組的習慣和湊熱鬧心態而進入了議場，並隨時準備衝突以避免被清場，當時在裡面精神渙散的帶議題討論，或和過去熟識的朋友隨意聊天，熟識的那幾個面孔仍是習慣拿麥克風的人，這些圖像大致和過往的運動經驗差異不大，對於抗爭張力或是人群動力，也沒有太多新的感受，除了覺得佔領議場很厲害以外，粗略地說，跟過去每一個衝場佔領等著被抬的感受，差距不大。

幾度出入議場，是由於過去經常參與各議題的活動，也組織過學生社團，寒假時剛辦完將近兩百人參與，五天四夜的大型營隊「庶人之亂」全國異議性社團交流培力營，所以也被一些社運團體視為有動員組織能力，因為意外地守住議場的占領狀態，當時決策機制和團體邊界都還很模糊，當時就被某些社運前輩找去內部幫忙協助議場組織工作並串聯學生社團，我選擇進入議場參與分工之後，還有很多運動路線和架構的變動，可是，我對這場運動第一個驚嚇的時刻，其實是在議場某日瞥到隔壁電腦螢幕有一篇介紹林飛帆身上外套的動態，乍看之下，還以為是誰又在惡作劇，走出去走廊時卻看見電視新聞竟正在轉播同樣的話題，那

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這場運動被抬高到什麼樣的位置，而這個場景跟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又是多麼的疏離，聽來荒謬，卻是我重新認識這個場域的重要時刻。

我驚嚇於捲入媒體影響社會氛圍的過程，記得有次以為能像過往那般習慣的玩笑姿態來互動，而在鏡頭前用了過於輕浮的行為舉止和話語，被解釋為花痴女學生與帥氣學運領袖的關係，成了電視上扭曲詮釋的樣貌，不對等的詮釋權鋪天蓋地捲動人們，那時對這場運動被報導的媒體生態非常反感，即便他人喜歡拿這個事件對我開玩笑，我也往往玩笑回覆，但我心底是懷抱著劇烈的厭惡感在看待此事。三月三十號的遊行過後，花邊新聞更持續發酵，終究一個被媒體推波助瀾而起的運動也會被媒體所反噬。

也驚嚇於大批人群在鎮壓當中的感受，過去我們將衝撞和翻牆當作習以為常的劇碼，激烈推擠甚至皮肉傷也不能算少見，卻在占領行政院的全夜，看著超乎想像的人群，懷著激憤的情緒，經歷鎮暴的苦痛，更煎熬的則是因為行動過程中不同人們之間的資訊不對等，讓懷疑和猜忌瀰漫在許多行動者和決策者當中，那段時間，很多合作過的運動夥伴，因為不同的位置而無法在第一時間內體諒和關懷彼此，甚至相互傷害，來不及跟誰好好解釋什麼，因為當時的氛圍殘酷到沒有人能夠在其中得到稍作喘息的機會。行政院事件對於在這場運動當中，相較於群眾，負擔較多責任、掌握較大權力的人，也就是過往我經常接觸的學生團體幹部的夥伴來說，無疑是最尖銳的問題，在龐大的訴訟壓力和漫長的責任歸屬釐清之下也不斷磨耗著這些運動者。

最初，我是被先前社運團體的人際網絡拉進立法院內，在我還未釐清眼前人們之間的權力關係、未想過該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之前，一天當中小小的立法院議場內有好幾個位置，分別開了幾圈紛亂的會議，但無論是討論的過程、參與的人和決議，都沒有完整累積到隔天的開會當中，於是我開始扛著筆電到處跑，憑藉著認識一些人取得信任，自願的寫下許多會議紀錄；後來場內開始有不同的組別各自開始運作，有人急切建議還能多做一點什麼，有人希望組別之間的資訊是流通的，能知道彼此在做些什麼，以免白費力氣，同時有人抱怨著別人，有小組控訴著別的小組，我便開始接下每日例行協調各組庶務的工作會議主持，大多數時間均在維繫由十幾個組別運轉整天的團隊行政庶務。

## 要去做組織，當一個組織者

回想起來，為什麼會選擇做會議紀錄和主持會議的協調工作，是來自於過去兩、三年在社會運動場域和異議性社團實踐的經驗，我們總是談著「如何組織」「如何當一個組織者」，面對一個突發的高張力運動，在超出預先的規模之下該如何有系統地做資訊傳遞和溝通，是當下我認為最重要的事，對於議題和路線的思考則來的較晚，較長期推動此議題的人會對議題論述有較大的發話權，而我一開始只覺得既然這場運動捲動這麼大的關注，應當要想辦法在這個處境下有更健康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由於運動空間上的限制，加上對於先前主抓這場運動的團體和本土派學者們認識不深，無法掌握當時的權力關係，所以和幾個社運團體的僅以身邊能夠掌握的，也就是議場一樓內部的工作人員為基礎去分組分工，並試圖累積起每天溝通的決議，也試圖和被辨認為運動領袖的人接軌，當然，在當時決策機制混亂、每日需面對各種難處理的狀況時，這些溝通和接軌的努力所獲得的代價都非常微薄。

在習慣開會的過程裡，我漸漸被當作一個工作狀態混亂時能夠諮詢的對象，有時新成立的組別說希望能參與開會決策，有人會焦慮地問他們的努力能否影響這場運動，有人說沒有參與感，有人說已經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意義卻不想放棄，有人哭著說他無法理解高深的語言；後來我盡可能的容納想要開會的人，在彼此溝通的意義與決策效率之間拉扯，我也試著主張無論是團體間負責做出重大決策的「聯席會議」，或是其他什麼重要人物的會談，都不能影響場內工作會議的進行，寧可延期也不取消，也要求工作會議的結論必須「向上」呈報給重要決策者。當時，我已開始對這場運動的意義有些保留，在無法商榷運動使用的詞彙語意以前，會下意識迴避直接影響決策的途徑，以免替什麼決策背書，但後來還是拐彎抹角的想建立起機制，而這樣的嘗試，迫使我們好幾次必須由夜半開會開到早上，在筋疲力竭的沮喪感和促進溝通氛圍的成就感之間打轉。

議場內每天都有各處的人群在流動。每幾天就有人想要成立新的工作組別，也有人想要尋找更多的參與方式；每天都有人在立法院裡掉下眼淚，為了找尋自己的位置；有人反覆做著同樣的事，有人以為能夠影響這場運動多一點點；有的人想要「指導」另一群人應當做哪些事，有疲勞不堪的控訴，也有峰迴路轉的刺激；每天都有人不斷質疑自我和身旁的人，也有挾帶不同野心和欲望的人在流竄。立法院到處都是媒體記者與不同聲望的人在搏鬥著，每天的事務都無法完整的累積成隔一天的基礎，無法形成一個有效的工作組織，這樣的每一天，每一個人，交織著複雜而緊密的網，在眾人面前以歪斜片段的樣貌張牙舞爪。

## 不在陽光下盛開的花

這就是占領期間我看到的樣子，與大群陌生人交會的過程中，選擇就地盤整和緩慢累積，開始待在特定的位置上，也順勢修復了處在尷尬位置產生的自卑感。然而，這個選擇讓我跌了又摔，摔出了不少珍貴的成長，卻也相應的付出夾擊在立法院內／外，以及夾擊在舊網絡與新人群之間的矛盾。即使我待了一個在大眾面前看似政治正確的位置，或看似比較接近權力核心的位置，但我既不是得到光環的人，也無法替其他人辯護或說明什麼，因為我確實不把心力放在拼湊種種事件的真相，我只想說：「停下來吧！」幾度在議場二樓的貴賓室看著陽台外的景色，壓力爆發時真會想一躍而下，諷刺的是，每當有這樣沮喪的心態出現，陽台外不遠處待命的記者和底下的駐警，提醒著若從此處躍下又會是什麼媒體效果，往往在這種動輒得咎的被凝視狀態下思考。

占領期間的後半段，決定延續著議場內的組織工作，自願在立法院裡面擔任庶務開會的協調者，沒有更積極地挑戰過去運動夥伴所質疑整場運動的種種弊病，沒有能將自己調整在一個能夠隨時開啟溝通模式的狀態，這些都不是因為我不在乎了，而是因為在當時我確實在遲疑和拉扯之間，找尋一個集體意義的實驗場，並曾經自信能在掙扎中找到改變現狀的途徑，所以游離各種定位，不放棄地掙扎與新認識的人們持續對話和碰撞，細微的互動經驗構成記憶主軸，直到離開占領狀態，我仍會夢見自己拿著小白板，列下各組工作狀態，統整紛雜的意見。更多的是自暴自棄，覺得過往的運動夥伴無法理解我當時的感受和抉擇，不信任感與強烈的情緒張力在我的運動網絡當中瀰漫，我開始封閉自己對這場運動更多的理想和期待，只想在有限的範圍內將議場內組織工作做的更好，在日漸縮短的開會時間和效率的增進當中，更真實的給了我運動中的成就和認同感。

那段期間，我對其他人的情感勒索在脆弱時開始變本加厲，同時也勒索自己，渴望自己被絆倒，而傷口最好能夠維持在同樣的地方，好讓自己的殘破更明顯一點，甚至渴望倒下，好讓我不必透過複雜而冗長的解釋，不必碰撞和消化很多人的情緒，就能直接逃離話語交鋒的戰場。五月初，已經離開立法院將近一個月了，當時我和一直以來相當親密的朋友見面，在自己右手內側割開一個小洞，那是對整場運動的情緒濃縮。因為在這場名為太陽花的運動當中，有很多地方是照不到太陽的。誰能夠想像一個運動參與者，因為運動當中累積的傷害而自殘，被認為是一個精神障礙者，而非充滿理想和正義感的學運青年？

如今已離開立法院半年多，當時有太多超出認知邊界的體驗，其所迸發出大起大落的情緒，似乎還滯留在二十四小時強光照射的議場裡，剩下還能夠拆解的記憶就成了下一步工作的檢討。無論踩往哪個方向，多走一步都是艱難的，面臨

著排山倒海的詢問與控訴，抵不過壓力而無處可逃時，我會將自己蜷曲起來，往傷口裡頭鑽，那樣才覺得安全一些，逃避的同時也得到了喘息空間。那是歡呼與熱情到不了的地方，這場運動，越是吸引到人群和指標事物所帶來的光芒，就讓陰暗的部分更顯得髒亂不堪，花朵終究可能照不到陽光，花瓣上也不會有明亮的色澤，卻是綻放的一種方式。只是照不到光的花兒們往往也不敢去爭奪圖像，不願身陷詮釋權的鬥爭當中，有太多無法公開表達，也不知道怎麼樣的陳述才是對所有人公允的，於是我只能提及這場運動時盡可能反身性的去看待自己的處境，對運動過程當中無法全面理解的事件以較包容的姿態去面對，並在自己和身邊朋友因這場運動累積起負面情緒爆發時，能夠至少守著彼此撐過這段時光。

## 民主鬥陣

出了議場，我仍然延續著自認為重要的「組織工作」，參與創立「民主鬥陣是」，民主鬥陣在三一八反服貿佔領行動告一段落之後成立的組織，成員為佔領立法院期間在議場內擔任各項工作組別的工作人員，也就是議場內工作會議的參與者，對我來說，之所以在後續一定要進行組織工作，和在校內組織異議性社團的意義差距不遠，每個剛踏入社會運動的個體，若沒有集體的支持網絡，很容易在運動現場當中迷失，找不到施力點，對身旁斷裂的認知環境感到不安，特別這次運動的規模和張力是近年來少見，而議場內常態的庶務工作人員又多為在三月以前未持續參與運動的「素人」，因為當時在議場內我所擔任的位置相近於統合與協調的工作，在出議場之後便持續參與後續組織會議。

民主鬥陣的組織形式並不是如議場內工作會議那樣較由下往上的開展，當時被認為是運動領袖角色的林飛帆希望能將大家統合在一起做事，便兜成了一個他所信任的核心小圈子，連結議場工作會議的人員和他所信任的、也就是現在另一個組織「島國前進」的夥伴，過去雖然都互相認識，但只有在這次佔領運動當中有合作經驗，創立組織的磨合過程中，很多人都抱持對運動和組織不同的想像，做事風格也多有差異，最後仍決定不以單一個組織做為實踐方式，而我們幾個最初被納入信任圈的人則成了民主鬥陣的幹部，在當時由於和決定不和以補正公投法路線為主的人馬共組團體，所以形成了想像中價值路線較接近且共享在佔領運動期間的連帶感，而錯估我們彼此有對於組織和運動路線和價值的共識，不可否認的是，當時決定要跟幾個過去並非真正有過深入合作基礎的夥伴以及「素人」們共組民主鬥陣，是過於草率的組織心態，認知基礎和信任基礎是非常薄弱的，只是受到這場運動的張力而擴大了彼此的連帶感，會積極組織起來並很快的擬定各項活動，背後所呈現的其實是更厚重的焦慮感。

前面提過這場運動被大眾所重視的價值，和部分參與者挫折感受之間有巨大的落差和斷裂感，在渾身是傷時仍想掙扎著做出許多對當前政府和財團的回應，是焦慮著無法延續被這場運動捲起的動能，深怕得來不易的議題能見度以及被撐開的公共議題討論空間無法延續下去，深怕錯失政治機會而在往後的運動實踐當中感冒懊悔，深怕二十幾天的占領和國家暴力的代價無法被反應到真實的處境改善上，所以我們許多人都在短時間內逼迫著自己去組織、去行動，花了很多時間進行溝通和關係修復，也花了時間去討論、諮詢來做出行動的政治判斷，但還是無法彌補過去未對議題和政治處境又更多集體的思辨和合作基礎，在議題串聯和動員上都各自遇到困境，回想起來，雖然沒有更高明的檢討和見解，但有個共通點是我們當時都在懼怕，預設著未來的人會如何看待這段歷史，深怕哪一步沒走好會導致將來不可原諒的後果，但在其中我們每個人是

否有那麼強的能動性，是否真的有那麼重要，許多的個人是否真的成為集體能夠做出決策，還是說只是延續著無架構暴政讓原先就掌握較高社會資本的人經由這次運動累積政治資本？

像這樣的衝突和自我質疑在運作組織期間陸續浮現，諸如無法處理過去運動網絡和當時素人為主的溝通文化和運動思考，對於性別或其他進步意識的認知和討論，用詞和論述的次文化及社科霸權，對於資源和權力的敏感度和戒慎恐懼，將組織過程中例行的工作和，最麻煩的恐怕還是對於運動和組織最初始的想像差異，畢竟從一個小地方的抗爭或各類型的議題開始參與運動，跟從一開始就在充滿鎂光燈、擁有歷史定位「學運」場域開始認知社會運動，對於策略、倫理和政治判斷均有很大差異，在占領運動結束後有不少政治資源想要挾注學生團體，在什麼樣的判斷下可以妥協於現實政治的資源，新成立的組織應該把哪些工作視為優先，究竟要不要發展成長期的組織，議題究竟要針對著國民黨政權打，還是要嘗試進入產業勞工處境，還是要以論述國際政治為方向去努力，這些都沒有辦法在幾次營隊或開會中處理，而我也理解到當初以為的共同體基礎，在資源介入時有多麼脆弱。

在組織內部基礎動搖的狀況下，身為最初創立組織以及擁有過往社運網絡連結的人，也在跨組織串連時犯下許多錯誤，錯估組織間的信任基礎，未重視各組織間的狀態以及內部矛盾，急著想以宣示性的策略同盟作為政治表態，並且在信任基礎和溝通習慣相距甚遠的狀況下過度仰賴科技物，期間擔任重要角色的決策者又紛紛陷入人際關係、親密關係與組織關係等等的挫折困境，以致暑假舉辦的跨組織營隊「自由街頭示範區」對於民主鬥陣、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和民主黑潮學生聯盟內部都再度捲起風波，原先被忽略的組織內外縫隙因為這個營隊而更加明顯，跟三一八佔領運動一樣，在短期內高張力的合作當中，原先以為可以包容的差異都紛紛變的具有攻擊性。在這次營隊之後，涵括著上述種種的價值衝突，我選擇淡出民主鬥陣。

## 左翼論述與他國經驗

占領初期，由於我先前對於服貿協議的理解較偏向工運的階級論述，諸如自由貿易的本質便是黑箱，且會弭平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障礙，使資本流動更加自由，在這樣的狀況下受害的會是各國的勞工階級，各國的資本家則受惠，故談論的觀點應著重於跨國階級而非國族，在運動過程中，我也曾和一些社運夥伴試圖以這場運動的慣用語言，諸如民主、世代等等詞彙來包裝一些檢討自由化和全球化政策的論述，且主張應有產業勞工的觀點。但那樣的嘗試沒有太多願意靠近權力核心的運動幹部去進行，以工運為首的團體也判斷無法在這場運動的主軸當中納入相關討論，更重要的是缺乏既有的草根勞工組織力量，長期以來台灣的運動發展以及左翼語言與群眾的疏離，也和這次左翼論述和行動較難影響整場運動的因素有關。

在這場運動當中我們經常喊著「退服貿，捍衛民主」但我們想像中的民主究竟是什麼？野百合學運奠基了代議民主，但這次參與的大眾出於對立法委員半分鐘過服貿事件的質疑，是對於代議民主以及台灣政黨政治的不滿，這有涵括在我們喊的精神和訴求當中嗎？事實上，以這場運動外在呈現出來的樣貌，衍生產品、運動藝術相關創作等等也都清楚展現出一個特質，便是從前年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流行的一詞「中國因素」，這並非偶然，國民黨二次當政，馬政權引發種種國族爭議，從野草莓開始就相當激烈，對中國的戒慎恐懼也理所當然的加深，而反媒體壟斷所造就的運動領袖，也就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領袖，資源累積和政治機會也對較為關注這個方向的參與者有利。我們所喊的「民主」其實是建立在「抵禦中國的不民主」之上，當台灣人聲援香港罷課、佔中行動時，也經常是出於共同抵禦中國的想像，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對於代議民主、審議民主、直接民主等等不同的想像則鮮少出現在運動主流版面當中，也因此在香港爭取普選的過程中，較少出現對於台灣本身走過選舉民主卻未能解決現狀的政治困境做出反省，但在反服貿的運動過程當中，仍然有人試圖去做不同的民主嘗試。

《為何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一書由運動核心參與者談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以無政府主義式的直接民主作為實踐，即便在政策訴求和性質上有巨大差異，但作者爬梳了美國對於「民主」概念的脈絡，也以當前金融資本掌控經濟體系的階級現狀作為輔助，談參與者的社會處境和參與運動的背景，對佔領華爾街運動做出相當豐厚的詮釋，可以想像的是，也會有許多參與者否定這樣的運動詮釋，但在台灣，目前還未能見到擁有相當知識量以及現場觀察的作品產出，對於民主的使用與反思也是往後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在議場內遇到社會學家 Erik Olin Wright，他對議場週遭的藝創作和通風管道設計感到讚嘆，也對這場運動提出了幾個疑問，我記得前面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反服貿運動是台灣與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但如果中國換成印度的話，台灣會不會有這麼強大的反抗聲浪？第二個問題是，運動很晚才突然決定要在三月三十日當天前往凱道集會，為何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弄出這麼完整的舞台、音響與溝通設備？學生真的有辦法做到這種規模的事情嗎？這些提問反映了在不同歷史文化下具有觀察敏銳度的人們，如何理解這場運動，其所指出的問題也都非常核心，指出了這場運動的「反中」遠高於「檢討／修正／反對自由貿易」，而遊行之所以能短時間做出那樣的規模，是因為反核遊行剛結束不久，當天總場控是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以及地球公民基金會主要負責，當然，在其他人力支援上，由於社運團體長期熟悉集會動員操作，所以他們其實扮演著比學生還更重要的角色，但在這場運動中卻沒有相應的累積，像這樣在台灣社會當中滾動的社運生態，有時透過不同脈絡的人提出來，也讓我們回頭反思我們所擁有的優勢和限制。

## 捆縛於歷史之中：沖繩交流

這次為期三天的沖繩交流之旅以及外加一天自助行程，是魏揚母親接收到高雄市關懷外籍老兵協會邀約，在短時間內敲定人選前往沖繩分享運動經驗以及對台灣獨立的看法，然而，出於我們對日本的不熟識以及相關單位聯繫的資訊落差，原先以為只是單純分享交流，卻在出發前幾天，由熱情的台灣留日學生向我們補了許多脈絡，得知日方團體的意識型態和做事風格與我們有相當大的差異，包括「反反美軍基地」立場和「民族主義右翼」等等，因而開啟了四個傻傻台灣學生的冒險之旅，我們笑稱是「四個蠢左」的「訪右」之旅，在荒腔走板的交流演講以及寶貴的抗爭現場參訪之中，有許多值得分享的經驗，所以寫下這篇心得。

到了當地首先就去參訪神社，非常日本傳統神道教的儀式巡禮，原本要接著去二戰紀念碑，我們提出希望能夠去美軍基地抗爭熱度正高漲的邊野古，日方團體也願意配合我們，於是，我們首日就造訪了搭著野棚、用大聲公喊著有節奏的口號，綁著「基地中止」布條的邊野古基地，而日方團體也透漏了他們不同的立場，認為沖繩必須依靠基地經濟，抗議人士多為外來者等等的說法。後來，在自由日的行程當中，我們又重新與當地左派抗爭青年，一同造訪了邊野谷和高江基地，較為深入的認識這群與我們風格相近的占領抗爭者，兩邊人馬的風格與意識形態差距更為清晰。

次日，白天我們和日方團體學生交流時，大致不脫原先的猜測，針對服貿議題，我們四位都提出了有關自由貿易的檢討、服務業勞工的權益受損以及全球化資本流動的結構因素，但日方只想著重在台獨的反中意識，並不斷強調沖繩人不夠警覺，未意識到中國的可怕，所以讚揚台灣人有明確的反中意識，當時我們的對話並沒有太多交集，當他們提出「貧富差距並沒有這麼大」、「慰安婦是被捏造的假議題」或是將我們所說的一切都轉譯成「所以確實都是國民黨的問題」，我們心中隱約是有點不滿的，最後，被告知晚上在博物館裡的分享，會包含兩個主題，一個是對兩岸服貿協議的看法，另一個是對沖繩和台灣之間關係的看法。主辦單位貼心提醒我，一定會需要提到美軍基地的問題，我便決定即使在公開場合也要清楚表明不同立場，以免我們的分享內容都被理解成反中立場，並以此來作為他們「反反美軍基地」的理念背書。

於是，在座談會當中，我引用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當中的一句話「何謂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並以失控發展的台灣本島和堆放核廢料的蘭嶼作為例子，在談身為台灣本島居於都市的漢人既

得利益者，對於大江筆下的內疚、反身和詮釋時戒慎恐懼的熟悉感。如果要談台灣和沖繩，那麼「台灣」這個想像共同體之中還有很多細緻的權力位階得要被正視。所以，我也想問自己「何謂台灣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台灣人的台灣人？」並把關照弱勢處境解釋我們參與社會運動的核心價值，也銜接了前面將服貿迫及服務業勞工、弱勢文化衝擊的討論。

而這樣的發言，引發了在場多數聽眾的躁動。當日方代表回應說「我想你們不懂沖繩的問題，恐怕是被中國影響的媒體所誤導」的時候，全場鼓掌叫好，我們四個愣在台上。接著，有一名聽眾針對我的發言，回以「沖繩是日本的一部分。」「美軍駐守在這裡，守護的不僅是日本，也是全亞洲的和平。」全場又報以熱烈掌聲，包括邀請我們的日方、台方代表，可見現場的聽眾同質性非常高。

那時，我的腦袋裡竄出好多聲音，包括過去聽了數千萬遍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句話，還有分析美國在亞洲軍事和經濟佈局的那些話，也就是往往在身邊聽到所謂「台派」和「左統」的差異，可是在這個情境，這樣的語句之下，竟然是如此模糊曖昧的結合在一起，我若在此時以「住民自決、獨立作為小國小民擺脫殖民的手段」這樣的說法像是台派在台灣經常使用的論述，若分析起美國因素，將軍事經濟踏入考量則像是在台灣被貼上「左統」標籤的那種論述，無論中美日台，究竟「國家」在我們核心關懷和現狀分析時，應該立於什麼樣的位置呢？

有鑑於現場的討論和迴響衝著台沖關係的發言而來，我就最後的回應當中僅說了以下這段話：「台灣和沖繩在歷史上有許多可以共同參照的處境，而台灣也同樣是夾擊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小國，甚至很多時候，我們不被視為是一個國家，但為什麼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見？那是因為看不見希望的年輕人無處可逃，被掌權者擺弄的弱勢者們也無路可走，必須站出來了，我們佔領街頭，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所以我們的聲音開始被聽見了，我對於沖繩並不是來自你們的媒體，我是帶著特定的價值和意識型態來看待美軍基地的，那也就是，在高牆與雞蛋之間，我會選擇站在雞蛋的這一邊，未來在理解台灣或沖繩的問題，或是思考兩個地方之間的關係時，我也會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待的。」全場一片尷尬，演講就這樣結束了，彼此彬彬有禮的招呼完，我們四個以及留學生學姊宇敏、學長紀全，連晚餐也沒跟主辦單位的人一起吃，就這樣鬧僵，也意外得到隔天參訪美軍基地抗爭的自由。

隔天一大早我們到邊野古海邊跟當地抗爭群眾，一同練習以獨木舟划行和變換隊形，這是為了當這次美軍基地填海造陸的工程要探勘動工時，能夠出航

進行阻撓，在練習當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抗爭紀律的重視，日常的練習是非常井然有序的，也見了長期反對美軍基地的運動前輩，支持沖繩獨立並關心高雄氣報災情。接著我們去了抗爭許久的高江，看見人數極少卻熱情而堅定的解釋著美軍基地在日本的整體影響，把抗爭期間逝世的夥伴遺照貼在棚子最顯眼的地方，桌椅上擺放著抗爭攝影集和友善農作產品，是很有溫度、很有人味的占領場所。

我們也在這兩個參訪地點的互動過程，以及晚上在居酒屋與抗爭青年聊天時，發現他們抗爭的週邊商品很少有標語和訴求，通常以自然生態和溫馨圖像為主，他們說「雖然這些圖像在日本一眼就認出來，但一定要用這樣的風格比較容易讓日本人接受」，不過，談到開發與資本主義的影響時則多有共鳴，由於日本一向被認為是比較親美的，我們問了他們對 **TPP** 的態度，他們也說那是資本家受利、對底層人民不利的自由貿易遊戲，在許多我們認同的意識形態上，其實差距並不大，但可以感覺他們較不如台灣那樣頻繁的談「獨立」，國族和地域的疆界的歷史差距就很明顯。

同樣在閱讀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時，很難不被其自咎、反身的筆觸所撼動，沖繩有其悲壯且複雜的歷史情懷，戰爭、經濟、殖民與國家身分的衝突，一個振筆疾書的既得利益本島人如何去描述與面對，我想，這樣的處境和拉扯，身為台灣人應該是相當有共鳴的，被統治的歷史，「回歸」的喜與優，漢人對原住民剝奪的，受到中、美兩大霸權的弱勢夾擊處境，終極一生從事抗爭的人們身上扛著的是眼前的人和過去的人所累積出愛恨交織的生活文化，很難不聯想到美麗島，聯想到為腳下這塊土地奮鬥的人們，平時總覺得談起這些顯得矯情，透過跨文化場域看見真實的人在進行著同樣理想的實踐時，卻不由得戰慄起來，這就是被歷史捆縛的重量吧，無論在什麼樣立場的人們身上都表露無遺。

此趟行程，特別感覺民間社會的跨國串聯經驗仍未被持續累積，特別是學生運動有其特殊脈絡，像這次我們出訪的四人就都未對日本左翼與社會運動領域有全面的了解，幸虧有旅日留學生熱心的從本島飛來沖繩幫忙，在他們的協助過程當中，也才了解台灣學生訪日這件事情本身，也會對當地留學生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我們若出席極右翼團體，相近的進步社群就會詢問留學生「所以你們台灣這次運動的訴求和價值是什麼？他們知道日本的狀況嗎？」因此，應該從每一次跨國交流的參訪當中累積紀錄，即便多元文化和國際政治是能夠習得的學問，但在實際對話和互動之中的認識是更深刻的，觀察不同文化脈絡下的抗爭，也才能夠對照當前台灣的處境找到新的出路。

## 自我感覺差勁的「既得利益者」

回過頭來看，被認為是「太陽花學運代表」出國參訪的事情，在這個暑假是很常見的，大多是在美台灣人團體的邀約，諸如此類的歐美國家邀約通常會希望是較有名聲或組織代表參與，能夠獲得這樣的資源和機會，無非是在這場運動累積到的政治資本，無論是媒體曝光、政治資源或是人際網絡，而我這趟會受邀，則是因為魏揚朋友的身分，同時也是因為在佔領期間的參與和後續投入組織工作的緣故，這樣的機會背後凸顯了什麼樣差距，是必須被檢視的，包括前述提到跨組織串連的失敗，也跟人際網絡的仰賴有所關聯。

對於許多關心、參與反服貿佔領運動的人來說，我很快能得到相關訊息，被納入意見參考的對象，並且由於過往的熟識和合作經驗，只要積極且願意在運動中付出，就很快能在占領運動期間取得一定的信任，也因為對不同地區和類型的運動者的了解，能夠有機會接觸到許多決策和事件較完整的解釋說法，當大群人被納入這場運動之後，原先就掌握運動語言及人脈資本的我，或許可以說是某種意義上的「既得利益者」吧，像我們這些本來就在所謂同溫層、社運圈的人來說，談論很多在這場運動中的運動傷害，也許在很多人眼裡看起來只覺得困惑，甚至當我們顧忌過往的組織關係以及運動倫理而選擇對許多說法保留時，認會被為我們在用很多的情緒來迴避責任承擔，在這樣的夾擊之下的自我感覺是很差勁的，我們既不是在運動中得到最多政治資本的人，卻必須被以相同的標準檢視和批判，而且我們通常比起那些拿著光環的人還要更在意過往同志的評論。

由於這場運動確實的影響了我舊有的許多人際關係，也因為我所熟識的朋友幾乎都是以前就高度參與社運的人，所有人都無法自外於這場運動，而且許多組織的裂解和許多事件的催化，使許多人都因此受傷，彷彿三月之後就有揮之不去的陰霾在這個圈子裡，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刻意迴避去談論。我很想完全撇開這段歷程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很想自私的說，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這一切不曾發生，在我身上，那些讚揚這場運動的說法，或者是我理性上也認可的這場運動的價值，都沒有辦法去填補我在這場運動之後的種種「病症」。當這場運動一再一再被提起，我只是疑惑到底這些事情跟我的關係是什麼，很多決策我參與其中，有些事件我也必須承擔起責任，但所有的人對這場運動的認知差異好大，我快要無法再把自己真實的體驗跟這場運動聯想在一起了。

每當我私下被問起這場運動，很多時候我是不願意說，或是用各種方式逃避，在社群網路上也經常因此展現出鬱悶的狀態，也有人問我「為什麼還要繼續搞運動呢？」我不確定這到底是不是矛盾，腦袋裡理性的判斷上，我還是會

希望社會運動是我的志業，對我所學習、信仰的價值而言，從事社會改革是最重要的事，同時我也沒辦法否認，即便三月這場運動具有多麼重要的價值，當我在其中被支解破碎，我還是會希望這一切沒發生過，我在運動中受到的傷害和挫折，除非實際的影響了我的生活，否則我還是會以不同形式投入在相關的事情當中。

這一兩年逐漸有「社會走向政治」的想法和嘗試，這種以結構、大集體為主的思考，例如說這場捲動起巨大能量的運動，在大方向的決策和操作上經常需要放下權力潔癖，當理想有能夠逐漸被落實的機會時，還是必須妥協於許多細節，然而，我現在覺得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反而是回到先成為一個對人保持真誠關懷的人，對自己的夥伴朋友保持忠誠與信任的人，像這樣的倫理價值先行於政治機會的拉扯，才是我能夠自適於政治場域的方式，對我來說，個人的問心無愧比現實的改革成果更重要，地球公民基金會以及綠黨的招集人李根政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搞運動並不辛苦，因為在這過程中你可以認識最良善的人」雖然是句看似矯情的話，畢竟在圈子裡混久了，會發現社運圈和其他集體連帶的網絡差異沒有那麼大，但在這次尖銳交戰的半年多裡，我還是會選擇去保持更多信任和寬容，去相信願意投入運動的人還是保有某些基礎的關懷，甚至我們可能因為運動而變的良善，當倫理價值的「對」以及運動妥協於現實的「錯」互相加總，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我想，那就是對與錯的總和吧。